



养老者说

被称为“超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似乎正在为中国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老龄化率将在2026年达到14%。中国和日本一样面临着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难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世所罕见,人口红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也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变的局面。上世纪70年代,日本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了80年代,这一标准被延长到60岁,而今则进一步延长到65岁。参考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日本社会养老体制,经验的共享或许能够为我们带来某些意义。

日本人为何能65岁才退休?

本报特约撰稿 岩崎克幸



日本福岛一家养老院里的老人们。(资料片)

国民养老金是基本,不同职业选不同养老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了80年代,这一标准被延长到60岁,而今则进一步延长到65岁。2013年4月,日本“高龄者雇用安定法”修正法正式实施,该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面临退休但有工作意愿的65岁以下员工。这一法案实施的背景,则是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推迟。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体制,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分为国民养老金(居住在日本国内的20岁—60岁之间的所有国民)、厚生养老金(以企业雇员为对象)和

共济养老金(以公务员为对象),国民可根据职业的不同选择加入。也就是说,国民养老金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网,所有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在此基础上,公司职员可以加入厚生养老金,公务员可以加入共济养老金。

因此,私营者、学生、自由职业者和无业人员,只要年满20岁都需要加入国民养老金。另外,公共和私人部门雇员及其配偶是通过向厚生养老金及共济养老金的强制性交费来参加国民养老金,而非直接向国民养老金缴费。国民养老金的最低缴纳年限为25年,支付开始年龄为65岁,而

厚生养老金与共济养老金则从60岁起开始支付。

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完备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过于乐观,养老金账户财政危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政府不得不将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支付年龄推迟到65岁。最近更出现了一些议论,建议将支付年龄进一步延长到68岁—70岁。但这样一来,规定“60岁退休”以及“65岁开始支付公共养老金”,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5年的收入空白期。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才会有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的法案出台。

40岁以上可参保护理保险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社会福利(高龄人口以及残疾人的生活保障)、公共帮扶(对生活贫困者的生活保障)、公共卫生(保证和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和社会保险(针对疾病、老龄化、事业、劳动灾害、护理等风险的保险)这四大支柱构成的。其中社会保险分五种,即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75岁以上)医疗)、养老金保险(前文的国民养老金)、失业保险、劳灾保险(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护理保险。

老年人的福祉与医疗的服务,本来是通过行政(地方自治体)税收支持的,但由于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社

会福祉费用和老人的医疗费不断增加,地方财政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日本借鉴德国的护理保险模式,开始实施“将护理的部分从增长的医疗费中剥离出来”,“将护理的承担者由老人的亲属转向社会”的理念,并于2000年开始建立了护理保险制度。

护理保险制度规定所有40岁以上者均为参保人。享受护理保险服务时支付的费用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参保人支付的保险费+需要护理人自己负担部分(一般是10%)+财政负担(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其中,除去需要护理人自己负担的10%外,护理保

险的财源构成方式是政府财政和参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各负担50%。其中政府负担的50%中,国家负担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负担12.5%。

为了接受服务,参保人需申请需要护理的认定,该认定工作由市町村(相当于中国的县和乡)负责。根据身心状态分为“不符合条件”、“需要支援1—2”、“需要护理1—5”等八个阶段,按照不同的阶段设定保费支付的基准额度。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每隔三年制定护理保险事业计划,针对各种各样的课题以及不断变化的现状对计划进行修改。

在职者缴纳保险费,支付退休者退休金

前面讲到因为财源不足,日本开始推迟公共养老金的支付年龄,但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并非累积式(即年轻时自己缴纳的保险费经过累积,退休后按照累积的金额领取),而是现收现付式(即在职的一代缴纳的保险费直接用于支付退休者的退休金),即代际转移体系。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日本由1960年的11.2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1个老人,逐步演变为1980年的7.4人,2000年的3.9人。预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减至2.3人,而2055年进一步减至1.3人。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年轻人的负担不断增大,支付养老金的

在职一代与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的“代际差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人们对公共养老金失去信心,国民养老金的缴纳率只有60%,而且越是年轻的群体缴纳率越低。

另外,推迟退休年龄到65岁,对年轻群体的就业也会产生影响。企业开始倾向于控制招收应届毕业生,并且比起引进稳定雇佣关系的正式员工,更倾向于通过劳务派遣方式招收员工,这样更便于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雇员人数。

在面临这样的课题的同时,世界各国也在努力构建使老年人安度晚年

的社会制度。作为率先跨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也正在不断地摸索促进社会发展的模式。日本在与世界共享老龄人口福利方面的经验的同时,也向承担着世界未来的年轻一代征求意见和政策措施。若只将目光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很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在职一代,以及承担者未来的年轻一代,甚至关系到地球命运的儿童,以更宽广的视角来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

(作者为北京日中双珠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香港政府的养老角色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电影《桃姐》引发了很多人对养老问题的共鸣。人口老龄化下的香港,政府的角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香港独居老人比例增幅明显,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一些措施,以便为香港老人提供更好的保障。其中的养老逻辑显而易见:养老需要社会资金和力量,但却不是简单的商业买卖和行为,政府的灵活性引导与强大支持保障必不可少。

带有福利性质的商业行为

在香港卓德资本董事总经理顾国泰看来,在养老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起到辅助的角色居多。

2011年,“安老按揭”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控股的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提出,这是一个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保险计划,它鼓励银行向55岁及以上的人士提供按揭贷款计划。

这些55岁及以上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人,可以利用在香港的自主物业作为抵押品,向参与银行申请“安老按揭”贷款。借款人可以在固定年期内(10年、15年或20年)或终身每月取得年金作为生活费。如果有急需,借款人还可以提取一笔贷款,以应付医疗费用等特殊情况。

2011年,香港有94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这些人中,除了公务员外,其他退休老人几乎没有固定收入。而最近十年,香港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

顾国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多数老人并不愿意去养老院,更想要自己的私人空间。拥有一处房产但生活拮据的老人不在少数,“安老按揭”针对的正是这一部分人群,使他们可以不依赖子女,把固定物业转化成流动资金,应对突发事件。

虽然带有一定福利性质,但这项按揭计划却是商业行为。这个商业保险并非香港特政府的强制行为。与买保险或存银行之类的行为类似,做不做按揭完全是个人的选择,香港特政府扮演的是立法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资助老人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务

“香港的公共医疗服务很完善,如果老人有需要,就去公立医院排队。公立医院很便宜,水平也很高。如果是很急的病,比如中风,公立医院会迅速解



电影《桃姐》里桃姐的角色,是香港很多老人生活状态的写照。(资料片)

决,如果是慢性病,就会慢一点。如果能承担,还可以去私人医院。”顾国泰说。

近几年,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推出方便老人去私人医院的措施。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长者医疗券计划,为70岁及以下的老人每人每年提供5张面值50元的医疗券,确保老人在享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基础上,资助他们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务的部分费用。

这个计划是对“钱跟着病人走”这个概念的实践,可以让老人在自己所属的社区,选择最适合他们的私营基层医疗服务,使他们更容易就近获得医疗服务和连续性护理,这为资助基层医疗服务建立了一个模式。

2013年,香港特区政府把长者医疗券金额增至每年1000元,每名符合资格老人每年可获发20张每张面值50元的医疗券。

补贴鼓励老人去广东养老

与中国内地相比,香港土地资源少,人手更少,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香港人在广东省的养老补贴计划。在顾国泰看来,特区政府此举是实际和灵活的。

依照这个措施,65岁及以上选择移居广州养老的香港老人,每月由特区政府发放高龄津贴1135港元。领款期间,受补贴老人不用每年返回香港,老人无须前往社会保障办事处申请,只需先填好“广东计划申请表”,连同有关的证明文件副本及两张近照寄回办事处即可。

当相关机构接到申请表后,会发信给申请人,确认已收到申请,并且会安排预约,邀请申请人亲自到办事处会面及完成申请手续。

目前,约有三万名香港老人在广东养老。受惠老人在每一个付款年度内,必须在广东居住满60天。首个付款年度是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在香港人何穗看来,养老需要社会资金和力量,却不是简单的商业买卖,还需要特区政府提供灵活性引导与强大的后盾保障。